

高校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下网络暴力行为生成的组态影响因素研究

顾城铖

西华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四川成都, 611745;

摘要: 由于高校的特殊性, 一些发生在高校具有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很容易演化为网络暴力, 其机理表现为信息环境、公众诉求扩展了网络暴力出现的“可燃范围”, 权威媒体报道、权威学者参与、政府发声及时性拓展了网络暴力激化的“助燃空间”, 事件性质则升高了网络暴力失序的“点燃温度”。通过探索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的组态影响因素, 从减少“燃烧物质”、控制“助燃剂”、降低“点火温度”这三个维度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策略。

关键词: 社会燃烧理论; 网络暴力; 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

DOI:10.69979/3029-2735.24.10.016

伴随着全球知识化、信息化步伐的加速推进, 网络已无可辩驳地确立了其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地位, 并成为公众发表观点、交流思想的关键平台。据 CNNIC 最新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4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扩大至 10.92 亿人, 同时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也显著提升^[1]。在此背景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洞察互联网发展大势, 多次就互联网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等核心议题发表重要论述。显然, 网络空间已跃升为国家治理领域中不可忽视的新疆域, 它不仅加速了信息的传播与交流, 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 一些发生在高校的具有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 如校园安全、学术腐败、道德失范等敏感话题极易演化为网络舆情危机, 进而演变为网络暴力, 不仅严重污染了网络公共空间, 还对高校及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害。因此, 深入剖析高校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下网络暴力行为生成的影响因素及其组态路径, 是防范和控制此类网络舆情风险的重要基础, 这一研究不仅为高校提供了应对突发网络舆情事件的策略指导, 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促进清朗网络空间的建设。

1 文献回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 网络暴力的形式和手段也在不断演变, 促使社会学者开

始采取多元化、跨学科的视角来深入剖析网络暴力的本质、动因及其社会影响, 为制定有效的预防及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2]。关于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是国内社会学学者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 其中主要涉及社会根源^{[3][4][5]}、场域特征^{[6][7]}、网民特点^[8]、监管缺位^{[9][10]}这四个方面, 并据此提出了包括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11]、提高网民群体素质^[12]、加强网络平台的责任和义务^[13]等多方面的应对策略。鉴于国内外社会背景的差异, 国外学者多以 Cyber bullying 指代网络暴力, 更多的聚焦于青少年群体间的网络欺凌行为, 并多与“校园问题”相结合进行研究, 倾向于采用定量分析研究青少年群体在网络暴力中的受影响情况^[14],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网络暴力的界定^[15]、成因^[16]、影响及危害^{[17][18]}、应对及治理^{[19][20]}层面。因国内外网络空间特性及民众诉求存在的差异, 国外高校突发事件难以在网络上引发大规模网络舆情, 故有关高校突发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少。

由上述分析可知, 国内外学者就网络舆情事件中的网络暴力行为研究及高校网络暴力这两方面的研究内容匮乏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且网络暴力往往由众多复杂因素影响, 定量方法也难以准确确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基于此, 本研究以社会燃烧理论为分析框架,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 40 个高校突发事件进行分析, 基于“燃烧物质”、“助燃剂”、“点火温度”这三个维度提取出会致使网络暴力行为出现的影响因素, 探究

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作用关系,丰富了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及网络暴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2 理论分析框架

2.1 社会燃烧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社会燃烧理论,巧妙地借用了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以此合理的类比复杂多变的社会状态,这一跨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创新,源自于中国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在2001年的深刻洞察^[21]。正如自然界中的燃烧过程需要燃烧物质、助燃剂以及点火温度这三大基本因素,社会状态的变迁同样需要一系列相互依存、共同作用的条件与因素作为驱动力。首先,社会燃烧理论强调了“燃烧物质”的存在,燃烧物质主要指能够产生燃烧现象、能够持续为燃烧现象提供能量的物质。在社会状态中,这种可燃物实际上就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积累。二是助燃剂,主要指在燃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但其本身并不能燃烧,如意见领袖、媒体的推波助澜等;三是点火温度,主要指燃烧物质由稳定状态变为燃烧状态的临界值,如突发事件等导火索。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该理论已经被学者们广泛的运用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2.2 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的生成框架

单个网络暴力行为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社会共性。社会燃烧理论在探究网络暴力行为、高校网络舆情等领域的应用中,为理解这类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1. “燃烧物质”的充分积累

“燃烧物质”指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积累,条件成熟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主要包括公民获取信息所需的技术条件、事件与公众利益的关联度,即“信息环境”、“公众诉求”这两个条件变量。本文所研究的“信息环境”特指信息软环境体系中的社会舆论环境,社会舆论环境作为舆情发展的风向标,映射出舆情发展的趋势、公众对于舆情信息的关注程度以及舆情事件所释放的影响力,是驱动舆情持续演变与深化的内源动力^[22]。而舆情自带的强大情感动员功能则让社会公众出于对自身情感满足而做出的附带网络暴力倾向和属性的

网络行为,且不同的情感极性在引发事件、推动事态发展方面作用各异。

2. “助燃剂”的有效推动

“助燃剂”指的是在网络舆情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影响要素如传播渠道、传播主体等,即“权威媒体报道”、“权威学者参与”、“政府发声及时性”这三个条件变量。权威媒体由于其公信力和影响力直接影响了网民群体对于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影响舆情的发展方向;权威学者在舆情传播中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其观点与看法往往能够对公众产生深远的影响。政府如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及时发声、回应关切,就能有效避免谣言的传播和误解的产生。

3. “点火温度”的刺激

“点火温度”指的是从平静、理性的讨论状态向激烈、非理性冲突状态转变的临界点或触发因素,这个临界点往往由某一具体事件的性质所决定,即“事件性质”。从客观事实的层面上来说,原始事件能否转化为具有较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网络舆情事件以及在后续形成具有网络暴力倾向或成为网络暴力事件,首先取决于原始事件特定的社会含义是否构成一个共同关切的公共议题^[23],而对事件性质的研究分类有助于研究者对数据的系统化组织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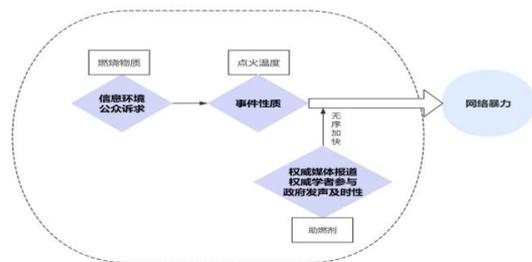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燃烧理论下的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作用框架

因此,本研究认为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的网络暴力行为是社会燃烧理论在现实社会问题中的具体延伸,这种契合性为深入研究及有效应对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的网络暴力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3 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3.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CA)作为一种兼具量化与质化特征的混合研究方法^[24],依靠布尔代数的基本原理并结合集合论的逻辑,来分析探究复杂多因素社会现象的动因

和影响方式^[25]，较为常见的有清晰集、模糊集、多值集3种操作方法。致使网络舆情事件演变为网络暴力行为其影响因素很难做出二分抉择，发生或不发生并不能衡量其是否导致网络暴力行为的生成，模糊集的连续概念为此提供了适用的分析工具。

此外，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于本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QCA在因果复杂性分析上的敏感性，使得它在中小样本分析上比基于数据的定量方法和基于单案例的定性方法更具优势^[26]。另一方面，网络暴力作为网络舆情的衍生物，其触发及加剧通常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演化过程，而QCA可以挖掘出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多因诱导条件组合下加剧网络暴力行为的路径组合。

3.2 选取典型案例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分类研究，并针对案例事件在社会议题维度的判别，将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划分为以下四类：道德沦丧类事件、权益受损类事件、安全危害类事件、社会热点类事件。通过知微事件库的数据支持，摘选了2021年—2024年这四年间具备一定话题影响力的高校突发事件，最终筛选出40例高校突发网络舆情案例进行研究。受限于文章篇幅，本研究在四类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每类分别精选了两个影响力较高的案例进行展示（参见表1）。

表1 部分研究案例库

序号	发生时间	案例名称	事件性质
1	2022	上海外国语大学通报学生咖啡杯被投放异物	道德沦丧类
2	2023	苏州大学回应学生恶意P图	道德沦丧类
3	2023	武汉一高校回应老人82元只买到俩素菜	社会热点类
4	2023	大叔被疑偷拍自证清白后仍被曝光	社会热点类
5	2023	上海交大就“食堂吃出针头”致歉	安全危害类
6	2024	台州一高校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事件	安全危害类
7	2022	湖南邵阳一高校花1800多万引进23名菲律宾博士	权益受损类
8	2023	学生举报高校称助学金名额被挤掉	权益受损类

3.3 设定变量及编码

基于上述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具体赋值原则可见表2：

表2 变量赋值表

变量类别	燃烧条件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原则
条件变量	燃烧物质	信息环境	知微事见数据库对某事件影响力的统计数据，均值锚点
		公众诉求	愤怒赋值为1，悲情赋值为0.67，积极赋值为0.33，非情感动员赋值为0 ^[27]
助燃剂		权威媒体报道（媒体）	知微事见数据库对中央新闻单位*参与事件报道占比的统计数据，均值锚点 ^[28]
		权威学者参与（意见领袖）	参与事件讨论排名前五的微博博主粉丝数量总和，均值锚点
		政府发声及时性（政府）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发声时间的提及，政府官方账号24小时内发声赋值为1，24—72小时内发声赋值为0.67，72小时后发声赋值为0.33，未发声赋值为0
结果变量	点火温度	事件性质	安全危害类事件的赋值为1，权益受损类事件赋值为0.67，道德沦丧类事件赋值为0.33，社会热点类事件赋值为0
		网络暴力	在案例中出现网络暴力行为的赋值为1，未出现的赋值为0

4 数据分析和结果

4.1 必要性条件分析

在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研究中，一致性指标反映了条件变量引发或促成结果变量出现的程度，即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关联的紧密性；而覆盖率指标则揭示了这些条件变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阐释或包含结果变量出现的情况，即反映了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解释范围的实质性覆盖水平。若一致性指标超过0.8时，则可认为该条件变量是导致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若一致性指标达到或超过0.9时，可以认定该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表3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Result	
	一致性	覆盖率
信息环境	0.546538	0.671550
~信息环境	0.453462	0.625796
公众诉求	0.885385	0.831347
~公众诉求	0.114615	0.242080
权威媒体报道	0.457308	0.637192
~权威媒体报道	0.542692	0.661200

权威学者参与	0.510769	0.684889
~权威学者参与	0.489231	0.617176
政府发声及时性	0.717692	0.666667
~政府发声及时性	0.282308	0.611157
事件性质	0.538846	0.608866
~事件性质	0.461154	0.705709

根据表3的运算数据显示,六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均未超过0.9,表明不存在任何单一因素能够被视为网络暴力形成的必要因素。但“公众诉求”这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为0.88,覆盖率为0.83,因此可以判定该条件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即当网民群体对某一高校突发舆情事件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诉求时,极有可能引发网络暴力行为。

4.2 条件组合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路径组合分析有三种级别的输出结果,分别为简单解、中间解、复杂解。合理有据、复杂度适中,同时又不允许消除必要条件的中间解被认为是QCA研究中汇报和诠释的首选^[29]。因此,本文选取中间解进行条件变量的组合路径分析,并将案例阈值设定为默认值1,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最终得出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影响因素的条件组合路径分析。

表4 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影响因素的条件组合路径分析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信息环境	•	⊗	•	•	⊗
公众诉求	●	●	●	●	●
权威媒体报道		•	•	⊗	⊗
权威学者参与	•		•	⊗	•
政府发声及时性	⊗	•	•	•	•
事件性质	⊗	⊗		•	•
一致性	1	0.933628	0.910072	0.83209	0.873737
原始覆盖率	0.123077	0.162308	0.291923	0.171538	0.133077
唯一覆盖率	0.0396154	0.0319231	0.108462	0.04	0.0211538
总一致性			0.89916		
总覆盖率			0.493846		

注: ●表示核心变量存在; •表示边缘变量存在; ⊗表示核

心变量缺失; ⊗表示边缘变量缺失; 空白表示变量非必需。

由表4可知,五条组合作用路径的总体一致性为0.89,表示这些组合方案具有较高的必要性解释力度;总体覆盖率约为49.38%,能够解释近半数的情况。进一步分析五条组合路径中存在的差异条件,可以归纳划分三种影响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生成的类型:

一是媒介赋权模式,由组合路径2和3构成。“公众诉求+权威媒体报道+政府发声及时性”是主要组合模式,一致性分别达到0.933628、0.910072,该组态表明即便央级媒体、官方机构的积极介入,当公众对某一高校突发事件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并表现出集体抗争的行为,这种情绪的集聚和发酵很容易演变为网络暴力行为。典型案例如“湖南邵阳一高校花1800多万引进23名菲律宾博士事件”,尽管央级媒体发挥其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作用,但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和匿名性使得信息的传播和接收并不总是那么理性和有序,公众仍然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抗争,部分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的煽动性言论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的混乱和公众情绪的波动,使得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

二是意见领袖引导模式,由组合路径1、3、5构成,该类路径以“公众诉求”和“权威学者参与”组合形式为核心变量。此类路径的特征体现为,在高校突发事件这一特定情境下,网络意见领袖的广泛介入往往成为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其高度引导性和煽动性言论易激起公众激烈情感,致使整个网络空间迅速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之中,公众的集体行为易于趋向极端,网络暴力行为由此滋生。典型案例如“学生举报高校称助学金名额被挤掉”等事件再次凸显了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论对于公众情绪及后续舆论走向的巨大影响。网络意见领袖为了紧跟网络空间中的热点话题,常在事件还未全面调查之前就依据个人的立场和见解,对事件进行主观解读和评判,错误地塑造了公众对事件的初步认知和态度。即便在事件调查真相被公布之后,政府、权威媒体积极介入并引导公众舆情,同时信息技术平台也采取减少相关报道等措施,这些综合努力仍难完全遏制网络暴力的发生。

三是政府倡导模式,该类型包含路径2、3、4、5。该类路径以“公众诉求”和“政府发声及时性”组合形式为核心变量。该类型路径表明,哪怕政府已第一时间迅速作出反应并公开发布相关信息,但调查需时、通报内容有限,难以即刻覆盖公众的疑问与愤怒,这种情绪

上的不满和焦虑很容易在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被其他信息源（如网络意见领袖等）所放大。典型案例为“台州一高校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作为高危害级别事件不仅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也促使公众对于信息透明度与事件真相的追求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台州公安”官微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回应，但通报内容的局限性无法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反而加剧了其疑虑，最终在社会舆论环境的强烈驱动下演化为网络暴力行为。

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经验，采用集合论框架下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其中核心环节在于剔除部分案例数据重新分析，以此检验研究结论是否仍然成立^[30]。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初始的40个案例中挑选并剔除了6个案例，这6个案例分别包含了3个最终形成了网络暴力的情境和3个未形成网络暴力的情境，然后对剩余34个案例导入QCA软件重新进行分析。稳健性检验结论显示，尽管研究过程中剔除了部分案例，但关键的分析结果即组态路径和核心条件并未因此发生实质性变化，证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具有出色的稳健性。

5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对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为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具体启示如下：

一是从减少“燃烧物质”入手，利用营造绿色网络舆论生态、法治化助推网络秩序等社会手段来引导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健全网络监管机制，对违法违规信息进行及时清理和查处是保障网络空间清朗、有序的必要手段。二是加强立法以规范网络秩序，明确的立法标准为网络空间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准则，各类网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得以清晰界定，网络活动的边界和底线得以明确。

二是从控制“助燃剂”层面入手，主要是通过制度性阻断、媒介型阻断、主体型阻断这三种阻断方法来控制和阻断网络暴力行为的扩散。制度性阻断是指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网络暴力事件系统化破解体系；媒介型阻断主要依托权威媒体引导其他网络媒体、自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共同维护网络舆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主体型阻断需界定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和信息边界，减少不实的

信息传播。

三是降低“点火温度”，其核心在于高校需自主采取科学的预防与应对策略。事件预防层面，高校可以建立舆论监测机制，密切关注本校学生的网络言语状态，利用线上平台和线下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收集体系，实时了解师生对于事件的态度与诉求。事件应对层面，高校可以构建舆情管理善后体系，依法规范问责失职者并表彰贡献者，在网络舆情平息或消解后对相关工作进行及时的总结、归纳与反思，留下书面文件存档备案，表明今后杜绝出现此类事件的态度决心。

参考文献

- [1]第5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3-22]. <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4/0325/MAIN1711355296414FIQ9XKZV63.pdf>
- [2]姜方炳.“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J]. 浙江学刊, 2011, (06): 181-187. DOI: 10.16235/j.cnki.33-1005/c.2011.06.032.
- [3]潘宇翔. 网络暴力事件中的道德失范现象及其反思[J]. 怀化学院学报, 2017, 36(12): 80-83. DOI: 10.16074/j.cnki.cn43-1394/z.2017.12.017.
- [4]樊祐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特殊网络暴力行为问题研究[J]. 中国卫生法制, 2022, 30(05): 80-85. DOI: 10.19752/j.cnki.1004-6607.2022.05.016.
- [5]肖遥, 齐巍. 风险社会视域下网络暴力成因探析[J].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 2023, 31(03): 85-92.
- [6]田维钢. 微博评论中的网民情绪传播机制及策略[J]. 当代传播, 2019, (01): 66-69.
- [7]周卫忠, 简梦芝. 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以“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为例[J]. 今传媒, 2018, 26(05): 49-50.
- [8]吴涵.“镜中我”视角下网络暴力伪正义浅析[J]. 新闻传播, 2024(02): 21-23.
- [9]张兆曙. 虚拟整合与时空交织：一个网络失范的理论框架[J]. 新视野, 2021(04): 101-108.
- [10]王俊秀, 云庆. 条件与机制：网络暴力的社会心态透视[J]. 探索与争鸣, 2023(07): 80-87+178+2.
- [11]张瑞孺.“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特质的法理分析[J]. 求索, 2010(12): 140-142.

- [12] 邓榕. 多元文化视域下网络暴力的本质、成因与文化对策[J]. 求索, 2015(5):5. DOI:CNKI:SUN:QSZZ. 0. 2015-05-036.
- [13] 刘胜枝. 微博热搜的价值、问题与完善[J]. 人民论坛, 2020(31):100—102.
- [14] Martínez-Monteagudo María Carmen,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thinking,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tres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victims of cyberbullying[J]. *Psychiatry research*, 2020, 286.
- [15] Smith P K, Mahdavi J, Carvalho M, et al.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8, 49(4), 376 - 385.
- [16] Shaikh, Farhan Bashir et al. Cyberbullying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ur among Malaysian tertiary students - A two stage SEM- ANN approach[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3.
- [17] Carlos E, Pablo R, Javier F, et al. Cyberbullying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J]. *Computers Education*, 2022, 176.
- [18] Gassem G, Ahmad A, Ebtihal E, et al. Prevalence and related risks of cyberbullying and its effects on adolescent. [J]. *BMC psychiatry*, 2023, 23(1): 39-39.
- [19] Tong Z, Zhao X M, Yang C Y, et al.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lonelines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vital mediator of general trust[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4, 221112567.
- [20] Salem S, Mahfouz A, et al. Empathic Skills Training As a Means of Reducing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3, 20(3):1846-1846.
- [21] 牛文元. 社会物理学与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1(1):15-20.
- [22] 胡象明, 刘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及风险规避[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 (02):96-107. DOI:10. 14112/j. cnki. 37-1053/c. 2023. 02. 020.
- [23] Xiao T, Weiwei C, Tian W. Do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respond to public opinion on the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2):266.
- [24] RAGIN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36-49.
- [25]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155-167.
- [26] 李晚莲, 曾锋. 公共突发事件网络谣言触发机制研究——基于40个案例的csQCA分析[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 12(03):124-137.
- [27] 王芳, 董绮梦. 基于fsQCA的事件信息跨平台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研究[J/OL]. *情报理论与实践*, 1-16[2024-08-1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762.G3.20240702.1552.002.html>.
- [28] 李晚莲, 高光涵.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热度生成机理研究——基于48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J]. *情报杂志*, 2020, 39(7):94-100.
- [29] Rihoux B, Ragin C C.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M]. Thousand Oaks: Sage, 2009.
- [30]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1312-1323.
- 作者简介: 顾城铖(2000-), 女, 汉族, 上海嘉定人, 西华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